

826 37071

明末清初文人 结社研究

何宗美 著



A1064107

南开大学出版社
天津

代序： 探测水下的冰山

陈 洪

宗美与我的学缘是偶然结下的。当时由于路数有别，他未能列于明师之门墙；而向学之心未泯，遂求教于我。在通常情况下，这种“战略转移”是很难成功的。但他的求学经历打动了我。他不是“正规军”出身，却始终苦学不辍；读书之博，悟性之好，都是不多见的。于是，我为之协调各方面关系，终于使他走进了南开的大门。

在新的学术环境中，宗美很快找到了努力的方向，并在眼界、路数、方法各方面迅速有了长进，直令同门师兄弟常有“非复吴下阿蒙”之叹。而弹指三年，终于以心血结晶成这部《明末清初文人结社研究》，无论其篇幅、其材料，还是其新见，都昭示出寒窗之下借月映雪的痛苦。

十几年来，学界同仁颇喜谈论“重写文学史”的话题。而十余年间，各色“文学史”问世多多，虽不乏佳作，但真正当得起“重写”二字的似尚未见。究其原因，是“史”观并无根本性改变。我们的文学史著作，基本路数都是时间框架中的作家作品论；而其构建基础则是经典化了的文本。有文本入得我法眼，作家便有一页半页之地；然后再溯渊源，析流派，形成一种“说法”；于是，“史”甚至“规律”便都了然纸上了。很多“重写”，不过是对筛选“经典”文本的法眼稍作改换而已。当然，作为文学系大学生的教科书，这种写法不仅未可厚非，而且很难设计出适用的替代方案。不过假若跳出了“教科书”的窠臼，那就会有很多选择摆到我们面前。

如果把经典化了的文本比作散布于海面的冰山的话，描画其

阳光下熠熠生辉之美景固然赏心悦目,而探究没于水面之下支撑这美丽一角的巨大“底座”,也是富有挑战性的工作;就其提供新的知识而言,也许比“描画”工作更有意义。

明清之际是文学活动十分活跃的历史阶段,这不仅表现为创作与理论批评所呈现出的少有的异彩纷呈局面,也表现为文人们相当广泛的结社与规模空前的社集。对于异彩纷呈局面的描画、分析,早已汗牛充栋;而对于文人结社——特别是与文学相关的结社活动,人们却缺乏研究的兴趣。其原因便是与这些结社活动直接关联的文本没有(或几乎没有)通过经典化这一关的。尽管社中颇多俊彦,尽管社集规模惊人,尽管社之兴衰关乎风气之转移、潮流之走向,也仍然不能使这些活动较多地进入文学史研究者的视野。而这些,便正是水面之下的冰山。

宗美这部著作借鉴了前人有关研究的成果,但在基本材料的发掘,对史料的理解分析,特别是结社与文学潮流的关系诸方面,颇有“自家凿破一片田地”之处。他所做的工作并不是文学史的“重写”,但这些工作为真正的“重写”准备了基础——当然不是惟一的基础,如同“水面下的冰山”也不仅仅是“文人结社”这一部分一样。

在这个研究范围内,宗美有一系列很好的构想,本书也可看作其宏大构想的“冰山一角”。以他一贯的韧性、毅力,我们有理由期待着巨大的“冰山”浮出水面。

目 录

探测水下的冰山(代序) 陈洪	1
----------------	---

绪 论	1
-----	---

一、释“社”/1

二、对有关资料和研究状况的简单梳理/7

三、明末清初文人结社研究的意义、思路/11

第一章 明代文人结社概说	17
--------------	----

第一节 明代文人结社的分期与发展演变/17

第二节 明代文人结社的基本特点/22

一、明代文人结社的地域分布特点/23

二、明代文人结社的组织与活动特点/29

三、明代文人结社的类别与性质/39

第三节 明代文人结社的渊源与背景/46

一、明代文人结社的渊源/46

二、明代文人结社的社会背景/52

第二章 晚明社会衍变与文人结社	71
-----------------	----

第一节 张居正改革及其对党争、结社的影响/72

2 明末清初文人结社研究

- 一、明王朝危机与张居正改革/73
- 二、张居正改革与晚明党争/75
- 三、张居正改革与文人结社/79
- 第二节 晚明党争与文人结社/86
 - 一、晚明党争概说/87
 - 二、晚明党争对文人结社的影响/91
- 第三节 晚明思潮与文人结社/102
 - 一、“汹涌如潮然”的晚明思潮/103
 - 二、晚明思潮对文人结社的影响/112
- 第四节 晚明科举与文人结社/129
 - 一、文社兴起的科举因素/129
 - 二、晚明文社的兴起与发展/133
 - 三、晚明文社的意义与影响/141

第三章 复社及其思想、学术与文学(上)

147

- 第一节 复社兴起的诸因素分析/148
 - 一、苏松地区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形态/148
 - 二、绅衿阶层的兴起/152
 - 三、民变与奴变/159
 - 四、复社与东林的关系/164
- 第二节 复社的形成过程与社集活动/169
 - 一、复社的形成/169
 - 二、复社的社集/178
- 第三节 复社的思想和学术/186
 - 一、复社的思想宗旨/188
 - 二、复社的政治思想/191
 - 三、复社的学术思想/198

第四章 复社及其思想、学术与文学(下) 207

第一节 复社的文学活动/207

一、京师的文学活动/208

二、吴中的文学活动/210

三、云间的文学活动/211

四、金陵的文学活动/213

五、杭州的文学活动/216

第二节 复社的文学思想/221

一、渊源论:绍绪七子,宗法汉唐/222

二、宗旨论:祖述六经,力返风雅/228

三、创作论:性情、学问与世运/234

四、异同论:地域、流派与文学观/242

第三节 复社的文学创作/250

一、愤世忧时之慨叹/251

二、忠臣志士之咏唱/257

三、融洽经史,意气雄迈/265

第四节 复社对文学的影响/270

一、复社与明末清初的传奇、杂剧/271

二、复社与清初的苏州文学/278

三、复社对清初文学思想的影响/281

第五章 清初明遗民及遗民结社 285

第一节 明遗民现象概说/286

一、《心史》与明遗民思想的形成/287

二、明遗民的生存环境/293

三、明遗民的生存方式/300

第二节 明遗民结社及其特点/308

4 明末清初文人结社研究

一、明遗民结社略考/309

二、明遗民结社的特点/317

第三节 明遗民诗社的文学活动与文学创作/325

一、惊隐诗社/325

二、甬上遗民诗社/336

三、岭南遗民诗社/344

第六章 清初东北流人及流人结社

353

第一节 清初东北流人的流放原因/354

第二节 清初东北流人的人生遭际与生存状况/361

第三节 函可与冰天诗社/370

一、函可生平及对结社有影响的一些因素/370

二、冰天诗社成员略考/375

三、冰天诗社的成立及其文学活动/380

第四节 冰天诗社及辽沈流人群体的文学创作/386

一、《冰天社诗》/386

二、函可《千山诗集》/389

三、辽沈其他流人的创作/396

第五节 七子之会及宁古塔流人群体的创作/399

一、宁古塔流人文学活动的几个阶段/400

二、宁古塔流人的诗歌/404

三、宁古塔流人的散文与杂著/407

结语:明末清初文人结社的影响

412

征引与参考文献

426

后 记

443

绪 论

一、释“社”

“社”之名，其源久远。据《左传》载，最早可追溯到共工氏时代，昭公二十九年云：“颛顼氏有子曰犁，为祝融，共工氏有子曰句龙，为后土，此其二祀也。后土为社，稷，田正也。”“社”指土地之神，即通常所谓社稷之“社”。

此义引出两个相关的意思，一是祭土神的活动叫社。见于《诗经·小雅·甫田》：“以我齐明，与我牺羊，以社以方。”二是祭土神的场所叫社，《左传》昭公十七年曰：“日有食之，天子不举，伐鼓于社。”按《礼记·祭法》之说，社有多种，遍及各处：“王为群姓立社，曰大社；王自为立社，曰王社；诸侯为百姓立社，曰国社；诸侯自为立社，曰侯社；大夫以下成群立社，曰置社。”^①

社的另一基本含义是古代地方基层行政单位。《左传》昭公二十五年曰：“自莒疆以西，请致千社，以待君命。”杜预注：“二十五家为社，千社二万五千家。”又，孔颖达疏：“《礼》有里社，……以二十五家为里，故知二十五家为社也。”^②社相当于“里”。以所辖地域而论，据《管子》卷一《乘马·士农工商》：“方六里名之曰社。”古制，立

① 《礼记注疏》卷四十六（本书征引的资料，其版本只在书末“征引与参考文献”中注明，注中不再一一标出）。

② 《春秋左传注疏》卷五十一。

社时须把社内人口及土地登录簿册,故社亦称为书社。书社一词,每见于《左传》、《晏子春秋》、《战国策》、《荀子》、《吕氏春秋》、《史记》等古代典籍。此在顾炎武《日知录》卷二十二《社》有详考,不再赘述。

综合两方面可知,社在我国古代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它与人们的宗教生活和社会生活息息相关。从前一方面讲,社既以一种宗教信仰植根于人们的心灵世界,并以一种宗教行为提供人们群体活动的场所和机会,由此不断培植和强化其社群意识和集体精神。而且,古代社祭往往伴随有一些巫文化活动,因此,社不仅是古代群体活动的中心,同时也可以说是古代重要的文化摇篮之一。后世之文人结社,与此不无渊源关系。

首先,社祭会饮是我国古代酒文化兴起的直接诱因,是诗社饮宴活动的文化渊源之一。南朝梁代宗懔《荆楚岁时记》载,社之日,“先祭神,然后飧其胙”。社祭时有社肉、社饭、社酒之类,且有“各以社糕、社酒相赍送”^①的习俗。据说,社酒可驱邪祛病,故人们无不尽情畅饮,以至在社日出现家家酒醉的情形。此在古诗中,多有反映,如唐王驾《社日》云:“鹅湖山下稻粱肥,豚栅鸡栖半掩扉。桑柘树斜春社散,家家扶得醉人归。”^②陆游的《新晴》一诗中亦有“社酒家家醉,春芜处处耕”之句^③。我国古代,酒与人生及文学艺术的关系至为密切,若从文化源头来说,社祭活动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而对社祭的高度重视则是由我国古代以农立国的社会性质所决定的,故此种风俗一直被沿用下来,至明崇祯时期仍如此。张大复云:“吾乡之社,始三之十三,竟十六。邑乘所谓‘喧填三日,一国之人如狂’指此。”^④

其次,社祭的赛会是我国古代艺术的重要舞台,是文人的艺术情绪和诗歌情结的源头之一。古代每逢社日,各地皆举行赛会和演

① 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八“秋社”。

② 《全唐诗》卷六九〇。按,“栖”一作“棚”。

③ 《剑南诗稿》卷十八。

④ 张大复《梅花草堂笔谈》卷五“里社”。

艺活动,包括迎神仪式中所扮演的杂戏、杂耍,称为“社会”^①。从唐、宋时期的一些诗作中,我们可以看到人们参加“社会”时的生动场面,例如王维的《凉州郊外游望》:“野老才三户,边村少四邻。婆娑依里社,箫鼓赛田神。灑酒洒乌狗,焚香拜木人。女巫纷屡舞,罗袜自生尘。”^②又如杨万里的《观社》:“忽然箫鼓来何处,走煞儿童最可怜。虎头豹面时自顾,野讴市舞各争妍。”^③优美的风俗画和争奇斗妍的“野讴市舞”激发了古代文人的诗情,而且,由于社祭之时“其时盖淑气清和,卉物条畅”,自然就出现了所谓“士女云集,亦歌风贡俗者所不废”的景象^④。在此,我们不难发现文人社集及其诗会活动由古代社祭赛会分化而出的某些痕迹。此外,“社会”还促使了社与诗的结合。《诗经》中《周颂》之《丰年》、《载芣》、《良耜》和《小雅》之《甫田》、《楚茨》、《信南山》、《大田》诸篇,大约即为古代的社诗^⑤。社祭诵诗祈年,与后世文人结社吟诗,二者性质不同,但就社与诗的结合而言,前者可视为后者之滥觞。

再者,宋元以降尤其是明代,文人结社每年举春、秋二社,受到了古代社祭之春社、秋社的直接影响。春社,在每年立春后第五个戊日举行,祭祀土神,以祈丰收,也叫春祈;秋社,在每年立秋后第五个戊日举行,丰收之后,立社以酬土神,亦称秋报。后世的文人结社也举春社、秋社,其活动内容固然与祭祀无关,但从举社时期的安排来看,显然与古代社祭有直接渊源。

另一方面,作为古代地方基层行政单位的社,它原本是人们生产与生活的最基本的社会单位。到后来,凡为某一目的自行结合的民间团体通常都称为社,其义实由里社之“社”所派生,比如弓箭

① 参看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八“秋社”条。

② 《王右丞集笺注》卷八。“灑酒洒乌狗”句中的“灑”读为 xǐ,通“洗”。此句四库全书本《御定全唐诗》卷一百二十六作“洒洒浇乌狗”。

③ 杨万里《诚斋集》卷三十七。

④ 《梅花草堂笔谈》卷五“里社”。

⑤ 朱熹《诗集传》卷十九谓《丰年》:“此秋冬报赛田事之乐歌。盖祀田祖先农方社之属也。”谓《载芣》:“辞意与《丰年》相似,其用亦应不殊。”卷十三谓《甫田》:“言奉其丰盛牺牲以祭方社。”他诗内容亦近。

社、钅社^①、没命社、霸王社、扁担社^②、应社^③、丝社^④等等。宋代,随着商业经济的发展和城市文化的繁荣,京城临安涌现了门类各异、数量众多的“社会”。据耐得翁所撰《都城纪胜》载,诸如西湖诗社、蹴鞠打毬社、川弩射弓社、锦体社、八仙社、渔父习闲社、神鬼社、小女童像生叫声社、遏云社、奇巧饮食社、花果社、七宝考古社以及光明会、茶汤会、净业会、放生会等,林林总总,蔚为大观,文学性的诗社为其中的一类。周密《武林旧事》卷三、光绪《杭州府志》卷七十六亦有类似的记载。

总之,无论是社祭之社,还是里社之社,后来的各类社团皆与之有一定的关系。但一般认为,文人结社的直接源头既不是社祭之社,亦非里社之社,而是东晋时期的白莲社。

白莲社,亦称莲社,晋元兴元年释慧远与慧永、刘遗民、雷次宗等人在庐山白莲池结社念佛,“率众至百二十三人,同修净土之业”,故得名^⑤。它是志趣、信仰相同者结成团体并以“社”命名的开端,对后世文人结社有深刻的影响。不过,此社尚属佛教性质的社团,与文学无涉。

文学性质的结社,据欧阳光考证,当始于中唐^⑥:“大历十才子”之一司空曙的诗中曾有“结社”、“洛阳旧社”等语,此为其结社之明证。《题凌云寺》:“不与方袍同结社,下归尘世竟何如。”又如

① 杜登春《社事始末》:“《宋杂记》载,弓箭社,诸阃帅都行之。王桢《农书》载,钅社合千家治田,有不任田者,众力助成之。”

② 《日知录》卷二十二《社》引《宋史·薛颜传》:“耀州豪姓李甲,结客数十人,号没命社。”《曾巩传》:“章丘民聚党村落间,号霸王社。”又引《元史·泰定帝纪》:“禁饥民结扁担社,伤人者杖一百。”

③ 同治《湖州府志》卷七十五《人物传·文学二》:“胡友信,字成之,德清人,隆庆二年进士,……乡立四应社,一乡有警,三乡鼓而援之。”

④ 张岱《嫫嬛文集》卷二《丝社小启》:“偕我同志,爰立琴盟,约有常期,……杂丝和竹,因以鼓吹清音。”

⑤ 晋佚名《莲社高贤传》。

⑥ 参看《宋元诗社研究丛稿》下编《弁言》。

《岁暮怀崔峒、耿漳》：“洛阳旧社各东西，楚国游人不相识。”^①后一诗中提到的崔峒、耿漳皆属“十才子”之列，可知司空曙诗中所言当为“十才子”的结社。姚合《极玄集》卷上“李端”：“与卢纶、吉中孚、韩翃、钱起、司空曙、苗发、崔洞^②、耿漳、夏侯审唱和，号十才子。”综合来看，说明“十才子”不仅有“唱和”之事，且有“结社”之实。

但对后世影响最大的倒不是“大历十才子”结社，而是中唐著名诗人白居易的香山九老会。《九老图诗并序》曰：“会昌五年三月，胡、吉、刘、郑、卢、张等六贤于东都敝居履道坊合尚齿之会。其年夏，又有二老，年貌绝伦，同归故乡，亦来斯会。续命书姓名年齿，写其形貌，附于图右，与前七名，题为九老图。”^③九老会由七老会发展而成，以谈禅娱老为主，与纯文学性质的诗社不尽相同，但因其为大诗人白居易所创，结社活动方面也有了诗酒唱和的内容，因此，它不仅为古代怡老诗社之祖，而且对各类文人社团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文人结社的现象，自中唐以后日益多见：晚唐、五代，承接风气；宋元时期，诗社林立；到了明代，出现了极盛之势；清代以后虽渐衰落，但余绪衍流，直至二十世纪之抗战时期。

由于文人结社经历了漫长的历史，在其发展过程中接纳了多种多样的文化因素，社团文化出现异彩纷呈的景象，社之名目与含义便不断增添新的内容，有关记载和资料则又较为零碎散乱。为此，我们有必要对以下几点再加一番梳理：

(1)“社”的几种含义：社团之“社”，彼此相关之义大约有四：其

① 《全唐诗》卷二九二、卷二九三。

② 四库全书本《极玄集》作“崔洞”。

③ 《白居易集》外集卷上。按，九老会的成员在《新唐书》中另有说法，指白居易与胡杲、吉皎、郑据、刘真、卢真、张浑、狄兼谟、卢贞九人。此说出自《白居易集》卷三十七《胡、吉、刘、郑、卢、张等六贤，皆多年寿，予亦次焉。偶于弊居，合成尚齿之会。七老相顾，既醉甚欢。静而思之，此会稀有，因成七言六韵以纪之，传好事者》及该诗原注“时秘书监狄兼谟、河南尹卢贞，以年未七十，虽与会而不及列”，但载中已明言后二人“不及列”。陶宗仪《说郭》卷七十五下，“香山九老”为白居易、胡杲、吉皎（即吉皎）、刘真、郑据、卢真、张浑、李元爽、僧如蒲（卢真、如蒲，《唐才子传·白居易传》作卢贞、如满）。

一,“社”指文人自行组织的有相对固定成员和活动地点并定期或不定期举行活动的团体,如元初之汐社、月泉吟社,明末之复社、几社;其二,“社”亦指并无固定成员的临时性的群体聚会活动,如明万历年间茅元仪举行的午日秦淮大社:“止生名元仪,初入金陵,作午日秦淮大社,赋得《午日题诗吊汨罗》,尽两岸之楼台亭榭,及河中之巨舰扁舟,无不倩也;尽四方之词人墨客,及曲中之歌妓舞女,无不集也;分朋结伴,递相招邀,倾国出游,无非赴止生之社者。止生之名,遂大噪,至今以为美谈。”^①其三,“社”有时指结社之所,如无锡碧山吟社^②、广东粤山社^③、扬州冶春诗社^④;其四,唱和、交游的作品汇编也叫做“社”,如随社:“麻城王屺生,自黄州入南昌,上广信,至临川,梓其征途所录,名曰随社。”^⑤

(2)社与会及“社会”:关于社,前文已多有阐述。“会”的含义有两层:一是与上述社的第一义相同,亦为社团之称,此在文人结社中极为多见,如宋代李昉汴京九老会、杜衍睢阳五老会、文彦博洛阳耆英会,又如明代杭州的耆德会、恩荣会、朋寿会、归荣雅会等。但略加比较,二者仍有一定区别,会的范围相对窄些,指怡老类诗社者为多,形式上通常不如社规范。“会”的另一意思是指社的集会,如复社的金陵大会、虎丘大会,此时社指团体本身,会指团体的活动。由此,“社会”一词亦有了两义:社、会对等时,即指社团,亦可称为会社;社、会为偏正词时,则指社之会。

(3)对文人结社的界定:弄清了社的含义和社、会的异同之后,我们还面临另外一个问题,即怎么界定文人结社问题。一般来说,结社是文人群的活动,但文人群的活动并非完全等同于结社,比如

① 周亮工《书影》卷二。

② 徐阶《世经堂集》卷十四《复碧山吟社记》:“碧山吟社,在惠山之麓。”

③ 陈田《明诗纪事》已签卷二引欧大任《虞部集》:“公实居曹日无事,……修复粤山旧社,招邀故人,相与发愤千古之事。”

④ 李斗《扬州画舫录》卷十:“扬州北郊建拳石洞天、西园曲水、虹桥览胜、冶春诗社……”

⑤ 艾南英《天慵子集》卷二《随社序》。

“竹林七贤”显然是一个文人群，却不能说是文人社团，因其并未立社举会。确定一个文人团体是否结社，当持一定的标准，才能使我们考察的对象明确化。这些标准最基本的可以概括为两条：第一，社名、社址、社长、社友、社约、社会、社诗等皆明确可考或部分见于记载的，这毫无疑问当归于结社之列；第二，在文人唱和酬答之作或有关记载中，出现过“诗社”、“吟社”、“同社”、“社中”、“社友”、“同盟”、“诗盟”、“诗酒会”、“文会”、“文字之会”、“结社”、“入社”等语的，也是结社的重要依据，例如《苏轼诗集》卷三十三《次前韵答马忠玉》：“河梁会作看云别，诗社何妨载酒徒。”杨万里《诚斋集》卷十九《二月二十四日寺丞田文清叔及学中旧同舍诸友拉予同屈祭酒、颜丈几圣、学官褚丈集于西湖，雨中泛舟，坐上二十人，用‘迟日江同丽’四句分韵赋诗，余得融字，呈同社》、袁宏道《潇碧堂集》卷一《五弟新卜园居，余笑曰：奈物力不敷何！社中遂以为韵，作诗嘲之，仍限四章，各四韵》，其中“诗社”、“同社”、“社中”等字眼，即为其结社的例证。概言之，既要有结社之实，又要有结社之名，是衡量一个文人群是否结社的总原则。

二、对有关资料和研究状况的简单梳理

文人结社，作为文学和文化现象，在我国有着一千多年的历史，值得对此进行全面而系统的研究。本文暂选取其中的一个特殊片断——明末清初的文人结社作为研究对象。

按照通常的研究步骤，在此我们需要先对研究对象的有关资料和迄今为止的研究状况作一次大致的梳理，藉此确定撰写的材料范围、依据和起点。

先看研究的主要资料。

明末清初文人结社的有关记载和资料既丰富又较为零散，可以略归为以下几类：（一）专门记载社事的史料，此有陆世仪《复社纪略》、吴伟业《复社纪事》、杨彝《复社事实》、杜登春《社事始末》、吴山嘉《复社姓氏传略》等，这些书的作者皆为复社、几社的成员或后代，对社局有真切的了解，故史料价值较高，是研究晚明社事不可或缺的第一手材料。（二）社中人物的诗文集，此类数量很多，难

以一一罗列,举其要者有张溥《七录斋诗文合集》、张采《知畏堂集》、吴伟业《吴梅村全集》、陈子龙《陈忠裕公全集》、陈际泰《太乙山房集》、艾南英《天慵子集》、罗万藻《此观堂集》、函可《千山诗集》、顾梦游《顾与治诗集》等,其中的社序、社诗常被后世有关研究者所引用。(三)明清笔记、杂纂,如朱孟震《河上楮谈》、张大复《梅花草堂笔谈》、屈大均《广东新语》、王应奎《柳南随笔》、周亮工《书影》、吴庆坻《蕉廊脞录》等,偶有文人结社方面的资料散见其中。(四)诗文类集、诗话、诗纪事等,如冒襄《同人集》、胡文学《甬上耆旧诗》、沈季友《携李诗系》、朱彝尊《静志居诗话》、杨钟羲《雪桥诗话》、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陈田《明诗纪事》几种较为重要。(五)记载明遗民的一些书籍,全祖望《鲒埼亭集》、佚名《皇明遗民传》、孙静庵《明遗民录》、陈伯陶《胜朝粤东遗民录》等,诸书涉及明清之际结社的材料不少,其中《鲒埼亭集》内编三十八卷、外编五十卷,以铭、表、志、传、序等文体表彰明季忠义之士,对他们参加结社的事迹多有留心。(六)地方志,此类资料最为浩瀚,不过,明代社局主要盛于江南与沿海各地,因此南直、浙江、福建、广东、江西等省的方志尤为值得重视,此其中又以结社最为活跃的苏州、松江、杭州、广州等地的府志县志最有价值。

上述资料由于产生的时间有前有后,作者的立场观点、学识水平各不相同,就文化背景来说又多经历了文化专制和大兴文字狱的清王朝,因此,在使用这些资料时有几个问题最值得注意:(一)要区别原始材料和派生材料,有选择性的加以使用,在二者有出入的情况下当以原始材料为准。例如《千山诗集》和《胜朝遗民录·函可传》记载函可冰天诗社的成员彼此矛盾,其中前者出自函可本人,后者出自民国初年的陈伯陶,显然当以前者为信。(二)正反相左的材料应对照考订,有所取舍。晚明结社因其与党争有着密切的联系,党同伐异之陋习虽在复社、几社亦在所难免,所以正反、是非之说,常常杂糅难辨。故自褒者未必为是,诋人者未必全非。拿复社、几社来说,张溥、吴伟业、杜登春、陆世仪等所述虽详,终为一面之词;艾南英、周之夔、陆文声、徐怀丹(托名)甚至阉党的劾奏、著述等虽多诋毁,也有参考的价值。(三)内容相近而各有侧重的材料

应取他说作为补充。吴伟业作《复社纪事》，计东有《上太仓吴祭酒书》与之商榷，二者可以互补。杜登春《社事始末》侧重记载社局之原委流变，陆世仪《复社纪略》侧重叙述士流干涉政治和社局中的彼此倾覆，前者详于几社，略于复社，后者恰恰相反，两书不可偏废。

再说研究状况。

从远一点说，陆世仪《复社纪略》、杜登春《社事始末》之类的著述，即已着手对明末清初文人结社予以总结和整理。清初，人们对结社问题的普遍关注，主要是出于两种因素。杜登春说：“盖以社局之兴衰，实有关于世道人心，匪可易视也。尚社局不振，悠悠终古，复社、几社血脉一断，则东林先生讲学明道之血脉亦断矣。可不惧哉？”故“撰为《社事始末》一册，以示后裔”^①，此为一种考虑；钱谦益说：“戊子中秋，余以银铛隙日，采诗旧京，得《金陵社集诗》一编，盖曹氏门客所撰集也。嗟夫！日中月满，物换星移；舟壅夜趋，饮猎旦改。白门有鸟，无树枝之可绕；华表归鹤，怅城郭之并非。”^②此又反映另一种心理。尽管与今天学术研究不同，但清初诸学者对于结社资料的搜集整理，事实上已澄清了许多有学术意义的问题。

二十世纪前半期，明清之际文人结社曾一度成为研究热点之一，发表学术论文数篇，出版著作一部；解放以后，此方面的研究渐显冷落，文章寥若晨星。现将有关论著依时间先后罗列如下：

李元庚：《望社姓氏考》刊于宣统二年上海神州国光社《国粹学报》第七十一期；

朱倬：《明季杭州读书社考》刊于民国十八年十二月北京大学《国学季刊》第二卷第二号，《明季南应社考》载于同刊民国十九年九月第二卷第三号，《明季桐城中江社考》刊于民国十九年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一本第二分；

陈楚豪：《两浙结社考》载于《浙江图书馆馆刊》第四卷第一期；

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1931年底撰成，1934年由商

① 杜登春《社事始末》。

② 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上《金陵社集诸诗人序》。

务印书馆出版；

郭绍虞：《明代文人结社年表》载于1947年《东南日报·文史》第五十五、五十六期，《明代的文人集团》发表于1948年《文艺复兴·中国文学研究号（上）》；

谢国桢：《顾炎武与惊隐诗社》写成于1964年8月，载于1978年《中华文史论丛》第八辑；

薛虹：《函可与冰天诗社》发表于1984年《史学集刊》第四期；

李绪柏：《明清广东的诗社》发表于2000年《广东社会科学》第三期。

综括来看，迄今为止的研究大致体现了这样一些特点：首先，基本的路数皆侧重于“考”，此仅看上述一些论题就能一目了然，余者从行文看亦不例外。之所以出现这种路数单一的现象，原因有三：一是在当时的学术背景下曾兴起考据的风气；二是从事这方面研究的除个别外皆为史学界学者，考证的路数体现了史家学风；三是在资料缺乏的情况下，从考证入手不失为研究工作之第一步。需要指出的是，自李元庚以来诸先生所做的考证工作，为我们深入地进行这一方面的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比如郭绍虞先生《明代的文人集团》一文，旁征博引，搜罗整理明代诗社、文社达176家，至今仍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其次，二十世纪前半期对明清之际文人结社的研究是在当时特殊的历史语境下进行的，往往与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密切相关，“世道人心”和忠义志节成为研究者最为重视的思想内核。谢国桢先生的《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在日本入侵我国的“九一八”事变后写成，该书的《自序》清楚地阐明了这项研究的宗旨是：“以党争和结社为背景，来叙述明清之际的历史，以唤起民族之精神。”并且说：“我觉得明亡虽由于党争，可是吾国民族不挠的精神却表现于结社。”朱倬《明季南应社考》大力表彰南应社二十八人“殆无一人降虏者”，其“明夷夏之大防”的用意不能说是没有时代意义的。但这种重思想内核的研究，往往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带较浓厚的主观因素，有时不免要影响或限制学术的思路。

其三，文学角度的研究尚属少见。文人结社既是明末清初重要